

北京繁昌记

[日] 中野江汉 著

韩秋韵 译



北京市方志馆
BEIJING LOCAL
CHRONICLES MUSEU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繁昌记

[日]中野江汉 著

韩秋韵 译



北京市方志馆
BEIJING LOCAL
CHRONICLES MUSEU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繁昌记 / (日) 中野江汉著 ; 韩秋韵翻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502-9120-1

I. ①北… II. ①中… ②韩…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1452 号

北京繁昌记

译 审: 汤重南

策划编辑: 夏艳

责任编辑: 章懿

书籍设计: **XXL
Studio**

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 64256863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120-1

定 价: 58.00 元

文献分社出品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 一百年前的老北京

王向远 韩秋韵

历史学家加来曾经说过：“历史是经过提炼的报纸，新闻的生命是短暂的，它的价值是长存的，唯其如此，昨天的新闻才构成今天的历史，而今天的报纸便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①《北京繁昌记》所收录的即是日本学者、记者中野江汉在民国初期陆续发表在各大报纸上的关于北京的新闻报道。在民国初期，他以一个日本记者的独特视角，带着读者观览了北京著名的历史遗迹，可以说《北京繁昌记》是老北京的写真。然而，正如编者中野达（作者的长子）在“解题”中所述，这部作品并非一般性质的“指南书”，它也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日本学者更倾向主观臆断的游记感想文，而是较为客观地呈现出 20 世纪初北京城或“繁昌”或“凋敝”的景象。

① 转引自韩秀丽：《从广告周刊到每日新闻纸——〈上海新报〉的历史考察》，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作品内容涉及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称得上是民国时期日本人研究北京的较为细致、全面的著作。

—

中野江汉，本名吉三郎，1889年4月13日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宗像郡南乡村朝町，其父名为中野三四郎，父亲的祖先原是武藏国^①的居民，活跃于“元寇”^②时期，是朝町的“地头”^③。中野江汉为家中次子。他在普通的高等小学读书，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时年15岁）毕业后，为了筹措旅费，他背着家人卖掉了一头牛，随后进京。在他离家时留下的字条里，附上了一首村松文三创作的名为《题壁》的七言绝句诗：

男子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

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他在东京寄宿于同乡茗荷谷的住所，一面做排字工，一面在英语学校攻读。那段时期，他在神田的基督教教会接受了外国宣教师的洗礼。

中野江汉在1906年（时年18岁）来到中国汉口，据说这一

① 武藏国，日本旧国名，位于今东京都、埼玉县及神奈川县东北部。

② 日本将元朝皇帝忽必烈与属国高丽分别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称为“元寇”或“蒙古袭来”。

③ 日本镰仓、室町幕府所设官职名。由源赖朝以维持治安的名义设立于全国各地，负责逮捕盗贼、征收年贡及轮流守卫皇宫与将军府等，逐渐演变为当地领主。后成为守护家臣。

决定是受到了福岡同乡们的影响。次年进入玄洋社工作。他就读于汉口佐藤胆斋的私塾“新民学社”，并在之后的几年中，广泛涉猎了从经学到民俗学的多个领域。他曾经承担过黎元洪的机关报《新民》的编辑工作，在1915年（时年27岁）借黎元洪北上之机，将自己活跃的舞台迁至北京。

当初在北京时，他住在川岛浪速的旧邸，可出入肃亲王府，担当法学博士严谷孙藏的助手。1916年10月创设北京联合通讯社，向中国各地的日文报社和日本的报社投递报道。同年10月31日，他在北京联合通讯社发刊，标题分别为“新派并非旧派之敌”、“选举副总统”和“蔡锷的恋谭”。1919年（时年31岁）4月，他加入京津日日新闻社（1918年创刊）并出任北京分局主任一职，自2月起开始连载《京津繁昌记》。翌年，改题为《北京繁昌记》。

1922年8月，中野江汉以“具体研究并发行有关支那的普通社会的学术、思想、风俗、文物等事项”为目的，设立“支那风物研究会”，刊发《支那风物丛书》。次年，从京津日日新闻社辞职，在担任各报社特派员的同时，专心致力于中国的研究。在1924年2月，作为研究会的会报，发行了《支那风物》。丛书和《支那风物》的发行断断续续，直至1928年停刊。

在1929年（时年41岁）6月，由于发生了张作霖被炸身亡的事件，北伐军大量涌入北京城。在同年9月，中野江汉开始正式将生活的大本营从北京移回东京。从此，他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活跃于东京的文坛和媒体方面。

以上就是本书完稿前，中野江汉的大体经历。关于作者的中国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不仅体现在上述的“支那风物研究会”的宗旨中，在《支那风物丛书》开篇所阐述的研究会的宗旨中也可

以看出来：

日本人观察中国（原文为“支那”，下同——译者注），最终必然会下一个“中国让人难以理解”的论断，我对他们的“视而不见”深表遗憾。这是由于那些观察者们是以日本的标尺来丈量中国的尺寸，或如从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猫头鹰一样去审视中国。倘若以中国的标尺来丈量中国的尺寸，以从明亮中寻找光明的平常心来看待中国的话，那么中国绝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国家。我等在华十几年，将用平常心观察、用中国的标尺所丈量中国，并把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向广大社会公开。倘若这套丛书能够成为观察者的一只普通的罗盘，那么我等甚为满足，这套丛书的构想也就有了意义。

从以下《支那风物丛书》的子目构成中，也体现出中野江汉的这种研究态度和思考方法。该丛书共分十三编，讲座两编，构成如下：

第一编，《北京繁昌记》卷一，1922年8月发行（下同），中野江汉著

第二编，《北京繁昌记》卷二，1922年9月，中野江汉著

第三编，《万里长城》上卷，1923年1月，中野江汉与小滨氏照合著

第四编，《支那戏剧》上卷，1923年6月，辻听花著

第五编，《支那的卖笑》全，1923年12月，中野江汉著

第六编，《支那戏剧》下卷，1924年4月，辻听花著

第七编，《支那的马》全，1924年8月，中野江汉著

第八编，《道教》全，1925年3月，橘朴庵著

第九编，《北京繁昌记》卷三，1925年8月，中野江汉著

第十编，《支那的社会》全，1925年9月，中野江汉著

第十一编，《支那的预言》全，1925年11月，中野江汉著
第十二编，《珍药秘药》上卷，1926年1月，中野江汉著
第十三编，《支那的国民性》全，1926年12月，中野江汉著
讲座第一编，《易的思想》全，1925年10月，山口察常著
讲座第二编，《中庸的思想》全，内野台岭著

由此可以看出，以中野江汉为首的这些日本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从基层民众文化到上层思想文化，用“具象”实证的方法，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立性、特殊性鲜明地呈现出来，并试图使人们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价值与真相。这一点使这套丛书有别于其他相关研究的学究式空谈，也有别于从政治立场出发加以研究的主观化倾向。

《北京繁昌记》所收录的北京的相关著述，反映了作者基本的研究态度和观点，是作者初期的代表作。作者富有探索精神，对古都北京这个全新的活动场所充满兴趣。正如他在《北京繁昌记》的自序中所说，想要了解北京，只能依赖中国的书籍作为“指南书”，于是遍访图书馆和旧书店，对传统的文献典籍也有所涉猎，耗时一年有余完成了案头的北京研究。然而，当他亲临实地后发现，文献上的记载与北京的现状多有歧异。因此，作者穿梭于实地与文献之间，进行调查和实证，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公诸报端。在研究中，作者不仅从史书中旁征博引有关北京风土文物的内容，还利用了地方志的文献材料，甚至还穿插了一些相关的重要诗文、各地的碑文及楹联等，在此基础上，将文献中的记载与北京的现状加以比较。这种细致的工作不免使人产生烦琐之感，但正是这种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方使民国初期的北京得以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本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由于《北京繁昌记》极富特色与价值，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在《北京繁昌记》第一卷出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22年9月22日）里，王朝佑先生翻译并发行了本书的中文译本。

《北京繁昌记》（第一卷）的译者王朝佑，生卒年不详，山东郓城人。据于奎战先生在专文中的介绍^①，王朝佑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的同文学院，毕业回国后曾担任北洋政府驻日本东京总领事，“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了华北伪政权。由于他在《我之日本观》的再版序言中发表了中日两国之间不应“惟小权小利之是争，而忘却同文同种之大义”，而是应该达成“共存共荣”、“中日提携”和“亚洲联盟”之类的言辞，而被判定为汉奸。由于历史资料不全，王朝佑的个人信息已经难以查证，但是他所留下的著述及研究成果，依然体现出了他对日本民族文化的透彻理解以及对中日关系的深层剖析。例如《我之日本观》（京城印书局，1927年）、《中国与日本》（北京文美书庄，1928年）、《亚洲之日本（附人类论）》（日本专修学校，1928年）等等，都有一定的价值。而王朝佑最早的作品实际上是一本译著，即这部《北京繁昌记》（第一卷），由北京醒中印刷社1922年出版发行。他在译者序中如此写道：

① 于奎战：《从民族心理的角度考察日本的国民性——王朝佑的〈我之日本观〉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日本人在北京设立“支那风物研究会”，专门调查我国风俗文物及社会一般之事情。《北京繁昌记》即该会出版丛书之一，以后当按时续出。呜呼！外人之研究我者，无微不至；而我之所自为谋者，果何如乎？吾译是书，在使国人知所警惕，刻自振拔，俾国家日进于富强之域，是则我之本意也。

中华民国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王朝佑谨识

关于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五年后他所撰写的《我之日本观》初版序言中也有论及。他认为：“日本人之研究我国也，无微不至，而我之对于日本也，则淡焉漠之。”这种研究现状应予以“根本铲除”，于是他在早期一直致力于“铲除”中国人对日本认识上的隔膜，试图促进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秉持这一研究目的，他首次尝试译介日本学者中野江汉的中国风物研究丛书之一《北京繁昌记》。立足于语言学的角度，译本通篇使用文白夹杂的文体，大都不合现代汉语的规范和习惯，现在看来语言已经老化，且存在较多的误译，也有漏译、编译等问题。

首先列举几个漏译的例子。

在开篇“景山”一节中，译者漏译了原文中的第一段（约计中文350字），即简述中国凄绝的“情死”物语和男同性恋“情死”的史实。这一部分置于作品开篇首段，且论述较为引人注目，故可排除译者出现“无意漏译”的可能性。译者之所以将该段略而不译，想必是由于这一段的介绍与“景山”这一主题之间的关联不甚紧密的原因。另外，在原文列举历代诗人描写景山的诗作时，译者漏译了“清词三大家”之一的纳兰性德的五言律诗《景山》。再例如，在“文天祥祠”一节中，译者漏译了尤为重要的文

天祥的《正气歌》的序文，共计 266 字；在对比日本的泉岳寺与文天祥祠中参拜者的多寡时，原书认为虽然前者因埋葬推崇《正气歌》的赤穗义士领袖而闻名，但是该寺的参拜者却比后者即《正气歌》本家发源地之文天祥祠逾出几倍。对于这段约合汉语 250 字的插话，译者也同样选择略去不译。类似上述漏译或节译的问题，在整个译本中不胜枚举。有的段落甚至仅译出段首一句，借以概括原文的整段叙述。如在“叮铃叮当”一节中，译者仅译出段首的“北京最堪注目之物，即为骆驼”一句后，将随后原文叙述的对于日本人来讲，骆驼“最堪注目”之理由的一段略而不译。此外，本节末段仅译出首句“吾人观骆驼颈悬铃‘叮叮当当’游行于北京城内。实不能无北京尚在原始时代之感”，漏译了该段随后对“铜驼”或“石驼”之类铜像或石像的描述。

其次，译本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编译”现象。

依然举“景山”一节为例。原文首先通过叙述崇祯帝与宦官王承恩自缢于景山的凄绝史实，引出对景山这个饱含悲剧色彩的历史遗迹的介绍。接着，原文记述了明末时期朝廷腹背受敌，农民领袖李自成乘虚而入，直逼北京城的历史事件。当时崇祯帝登临景山，远望连天烽火，自知大势已去，遂令皇后自缢，砍杀嫔妃，最终登上景山，于槐树下自缢身亡，提督太监王承恩追随而去。原作者在讲述这段关于景山的亡朝哀史后，接着介绍了景山上的亭阁殿宇、崇祯帝自缢的古槐，以及景山的别称“煤山”的由来、景山明媚的山势以及登临山顶俯瞰宫阙的凄婉惆怅之情。原文叙述富有层次，前后衔接得当，简明扼要地介绍出景山的史海钩沉，通篇纪实与抒情相得益彰，行文可圈可点，尤为精彩。然而，在王朝佑的译文中，如上所述，译者“漏译”了开篇由中国“情死”话题而引出崇祯帝与王承恩于景山双双自缢的一段

文字。除此之外，在通篇译文中，译者按照自己的意趣将文脉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译介时，他首先将原文中对景山及其周边概况的描写一并提于卷首，进行集中译述；接着，再译出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帝与王承恩自缢于槐树的史实；最后一部分同原文一致，即登临景山直抒胸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忠实地遵循原文的构架顺序，而是按照自己的写作习惯将原文结构进行天翻地覆式的“编辑”，这样做，已经僭越了译者的身份，似乎更像是一名“编译”者。颇为遗憾的是，诸如上述的“编译”现象，在王朝佑的译作中可谓俯拾皆是。

再者，该译本出现了译词和句法老化等现象，另外也有诸多译词“死译”日语词汇，例如“爱赏”（喜欢赏玩）、“借本处”（借书处）、“足袋”（裹脚布）等。由于译文中大量出现类似词语，想必会给当代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

除上述问题外，译者在翻译时还出现了漏译原文注释、缺失必要的译者注释及作者简介等疏漏。另外，从现有原作的版本^②来看，《北京繁昌记》一书集合了原载于《京津日日新闻》中的原题为“京津繁昌记”的相关报道，其中主要以大正八年的报道为主，余下的篇什多数被编集在《续北京繁昌记》之中。由于王朝佑的中文译本只译出了《北京繁昌记》的第一卷（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而且译本出现了上述种种问题，因此现在对此进行复译，并将王朝佑未译出的占原书四分之三篇幅的文字全部译出，使原作得以完整地呈现到中国读者面前。

② 中野江汉著，中野达编：《北京繁昌记》，东方书店，1993年12月15日。

按作者在原作“凡例”中所述,《北京繁昌记》主要收录的是大正八年(1919年)春执笔的文章,并于大正十一年(1922年)七月再次亲临实地考察后,对相关记述进行了大范围的增补和修订。那么在1919~1922年间,北京处在怎样的历史动荡中呢?这座昔日万国朝拜的帝王之都,又是以何种姿态呈现在中野江汉的笔下呢?

在书写《北京繁昌记》的1919年,正值北京爆发大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之际。此前在1915年5月9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临时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致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在满洲及蒙古的势力范围。随后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之列,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掌控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作为交换条件,北京政府与其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咨文,最终导致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反而失去了对山东省的控制权。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严重的外交失败,加之北京政府内部派系权力之争的混乱腐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和民国政府极度不满,纷纷冲上街头,反日示威活动此消彼长,国耻情绪难以压抑。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新文化运动促进的思想解放,加之《巴黎和约》的签订等种种原因,终于在1919年5月4日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一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捩点,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自我意识的崛起和对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由于各方各界的通力合作,这场彰显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换来了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所签订《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

条约》及其附约，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的主权和胶济铁路的权益。

此后，关于日本侵华企图的日益显现，导致日后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并且在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组织抵制日货的活动。在历史上中日两国共发生六次正面交战，在第五次中日甲午之战（1894～1895年）中，中国完败，中国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直到中日第六次战争打响（根据远东军事法庭裁判，“中日战争”应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开始）之前，中国人已经对企图全面侵华的日本政府切齿不已。《北京繁昌记》的写作期间，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就是如此。中野江汉作为一位日本记者、学者，在中日两国剑拔弩张的敏感时期内，只身一人来到中国，积极地号召广大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并身体力行地开创“支那风物研究会”，完成对北京的一系列报道与研究，这与当时日本政府和学界试图深入了解中国，以服务于全面侵华的政治目的当然是不矛盾的。但中野江汉推行日本人的北京研究的主要目的，总体上看还是处于求知的层面上，并没有表现出露骨的功利目的，他认为现在“没有可以了解北京的正确而详细的日文指南书”，而“欧美人的著述”也“并无特别值得信凭的著作”，中国人自己的著述“只是罗列掌故，甚少触及我们想要了解的部分”，因此他决定以研究北京来叩开“中国研究”的大门，并进一步完成一系列的“中国风物研究”。从全书来看，作者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位“秉承职业操守的新闻记者”，除了原作中少部分的措辞外（如“支那”一词，“支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旧称，含有贬义，此后编者已全部更正为“中国”），书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能够秉着较为公正、客观、审慎的态度，如实地复原出民国初期北京城的旧貌。在当时中日两国复杂的时局下，在旧

中国彼时落后日本近五十年的境况下，作者仍然能尽量掩抑主观倾向而进行如实报道写作，践行他“秉承职业操守的新闻记者”的职责，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四

《北京繁昌记》的书名似乎是仿照日本江户文学名著《江户繁昌记》而得名。《江户繁昌记》的作者寺门静轩（1796~1868年）因撰写此书而成为江户文学中“繁昌记”系列的鼻祖。自1872年11月起，《申报》开始连载其中文译本《瀛寰琐记》（后更名《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从而该作成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翻译文学作品。寺门静轩受清代作家余怀所著《板桥杂记》一书的启发，主要介绍当时江户（东京）地区的市井风物和风俗人情，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笔记小说。《北京繁昌记》似乎也有意延续“繁昌记”系列，不同的是，由于作者的“记者”身份，该作倾向于对当地景观进行如实报道；而《江户繁昌记》则侧重于细致入微地描写花街柳巷的风俗人情，是17世纪以降日本江户时代市井文学的一贯风格。

纵观《北京繁昌记》一书，从内容上来看，作者几乎对北京主要的名胜古迹加以一一介绍。其中包括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明清两代皇室祭天地神建筑群天坛、地坛、先农坛、社稷坛等；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以及其他著名宗教类建筑景观，包括孔庙、隆福寺、护国寺、法源寺等；名人的故居祠堂，包括文天祥祠、松筠庵、顾亭林祠等。除上述的著名的人文景观外，书中还介绍了一些以迤逦的自然景观为主的北京名胜之地，其中包括景山、陶然亭等。作

者另设一篇环城游记，带领读者游赏北京城外的旖旎春色。“青墨般”的太行山、“柳树隧道”、斑驳的角楼，在曳船上的作者眼中都别有闲情。不仅从河面以“仰角”的“镜头”捕捉远山、楼阁，还有乘飞机从空中“俯瞰”北京的记述。据作者自述，他是第一位以“记者”身份乘飞机翱翔于北京上空的日本人。报道中如实记录了从高空俯视北京城的景象，不同于在地面观览时的雄伟壮阔，从空中俯瞰京城时，黄蓍丹壁的紫禁城形同排列着的“火柴盒”、壮阔的祈年殿和皇穹宇“有如大小两只倒卧的蓑笠”、“圜丘”宛如白色的圆盘等。另外，作者也真实且细致地描述了同乘人员第一次的飞行经历，其中对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描写真实且颇有趣味性。这一篇报道比喻精巧恰当，描述极富实感。

在描述北京时，虽然作者意在尽量公正、客观地呈现出北京面貌，但由于中日两国在近代文明及城市化进程方面的落差，作者对北京城的肮脏和落后也带有描写。文中多处出现了“因肮脏的尘垢和粪便令人产生不快之感”，“屡屡撞见随意脱屎放尿”的先生，“所至之处粪便堆积如山”；“妇女们正在河中洗浣”，“在如此浊水中若无其事地洗涤衣物，总归令人产生一种肮脏感”；“抵达阜成门时，我已满面尘沙、灰头土脸”；“这样看来，不得不首肯所谓‘飘然天地晦冥’、‘黄尘天掩白日暗’，抑或是‘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之类的诗句了”等等。除了当时中国的卫生条件令作者咋舌外，北京人的一些做法也引起了作者强烈的困惑和不解。例如：“在作为历史遗迹的著名的历代天子亲耕台上，将相关建筑改建之后还能心安理得的现代中国人，犹如焚琴煮鹤般毫无风雅可谈”；人们竟然将“被掩埋于矮墙之下”的“明朝五大钟之一”的永乐大钟作为墙，“在其后方挖了一个洞，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公共厕所，周遭臭气熏天”，“将如此著名的大

钟当成如厕时的‘盾牌’，这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表演出来的绝活，恐怕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对于这种遗址，只要在木板上附以文字介绍，便会给参观者带来便利，但中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异常冷淡，因而常常令游人颇感不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视祭祀为举国大事。因此象征着劝农敬祀两大目的的亲耕祭典成为治国不可或缺的手段。秦颠汉仆，无论历经几多寒暑，只有这个祭礼历代相沿，没有废止，即使一时中断也能立即复兴，但进入民国后已被完全废除。新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古雅的典礼几乎全然不知。或许复兴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等议论。这些在当时的北京人看来也许不以为意，却引起了中野江汉等日本学者的深深感触。今日读来，依旧耐人寻味。

最后，译者需要再补充几点：1. 原作编者将引文中的大部分碑文及原书附记皆附注在各篇篇末，译者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统一将其处理为脚注的形式。2. 原文在计算历代皇帝的顺位和年代时出现多处讹误，译者在翻译时直接做以修正，不再一一赘述。3. 原文部分引文中出现了字词、标点和断句错误或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述，译者酌情进行了修改和调整。4. 原文中的引文与注释的引文出现重叠时，译者自行删节了注释的引文。5. 由于译者序中对作者中野江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故删去了原作的“作者简介”一栏中的内容。

2014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